

DOI: 10.14015/j.cnki.1004-8049.2018.3.002

袁伟华：“联盟战略有效吗？——权力转移、联盟战略与主导地位”，《太平洋学报》，2018年第3期，第12-27页。

YUAN Weihua, “The Effectivity of Alliance Strategy: Power Transition, Alliance Strategy and Dominance”, *Pacific Journal*, Vol.26, No.3, 2018, pp.12-27.

联盟战略有效吗？

——权力转移、联盟战略与主导地位

袁伟华¹

(1.天津工业大学,天津 300387)

摘要：在无政府状态下，联盟是国际关系中经久不衰的现象，对于联盟的关注亦是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处于权力转移进程中的主导国，总是试图维持其在国际权力结构中的地位，联盟是其可能采取的战略之一。然而，在权力转移进程中，衰落的主导国面临的结构性压力不断增大，对于盟友的战略依赖越来越深，对于盟友行动自主性日益缺乏约束力。同时，主导国的联盟战略加速了国际社会既有联盟网络的复杂化，极大提升了主导国卷入国际冲突的可能性。处于衰落中的主导国，在大战中无论胜负，都要付出巨大代价，从而加速衰落进程。二十世纪初，英国放弃了“光荣孤立”政策，转向联盟战略。七月危机是奥匈与塞尔维亚之间的地区冲突。但是，英国的联盟战略既无法制约盟友，也不能威慑对手。在俄国、法国、德国先后卷入冲突的情况下，原本并不关注七月危机的英国也被迫卷入冲突，并在战争中严重削弱了自身实力。在战后重建中，英国不得不接受与法国、美国共享主导地位的现实。因此，英国以联盟维持主导地位的战略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关键词：联盟战略；权力转移；主导地位；七月危机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049(2018)03-0012-16

联盟是国际关系中经久不衰的现象，曾长期缺席国际关系研究，但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迅速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对于联盟的研究已经贯穿了联盟缔结、维持、瓦解的整个过程。国际关系中的联盟不仅仅是国家之间的联合体，而且是最古老的国家安全战略。然而，现有的联盟研究对于其作为国家战略工具的特性关注不多，尤其缺乏对于联盟实现战略目标有效性的分

析。诚然，联盟作为国家安全战略之一，实施该战略的国家意图各异，绝非一篇论文所能涵盖。因而，本文将研究问题限定于，在权力转移之际，联盟是主导国维持主导地位的有效战略吗？

在权力转移进程中，联盟一直是主导国维持其地位无法忽视的战略抉择之一。两千多年前，修昔底德(Thucydides)笔下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就是源于雅典实力的增长引起了斯巴达的恐惧，

收稿日期：2017-02-25；修订日期：2018-01-07。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实践探索”(13&ZD04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袁伟华(1978—)，男，江西分宜人，天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外交、国际关系理论。

而当时存在的复杂联盟网络加速了雅典和斯巴达卷入战争。^① 当前, 美国经济处于相对衰落进程, 其在2015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提出, 联盟战略是维持全球领导地位的重要工具。^② 尽管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 在竞选时承诺, 要摧毁前任奥巴马(Barack Obama) 缔结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但是美国驻亚太地区的六位大使联合表示, 摧毁这一协定, 是关键时刻对盟友的抛弃, 会损害美国作为太平洋两岸领导者的信誉, 严重动摇美国的战略地位。^③ 特朗普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亦指出, 盟友和伙伴增强了美国的权力, 扩大了美国的影响。^④ 然而, 美国的亚太联盟战略直接关乎中国安全和地区稳定, 如何避免因美国的联盟战略而导致中美之间都不愿意发生的军事冲突, 是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重大命题。^⑤ 同样, 在权力转移进程中, 为获得国际社会主导权, 崛起国也可以采取联盟战略, 通过力量联合实现崛起目标。19世纪中叶, 在崛起和统一进程中, 德国就非常善于利用联盟战略, 赢得了有利的国际环境。进入21世纪之后, 中国国家实力不断增长, 联盟战略亦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⑥ 概言之, 从国际关系史看, 权力转移之际无论是主导国还是崛起国, 都考虑联盟作为实现一国战略目标的工具。

由于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 一国对于它国权力的增长较为敏感, 尤其是对方权力增长可能导致其在权力结构中地位下降。在这种情况下, 一国希望调整战略巩固其在国际权力结构中的既有地位。对于任何一国而言, 增强其国力不外乎内外两种方式。联盟战略即是一国借助外部力量实现其渴望实现目标的手段。在权力转移之际, 主导国希望凭借联盟抵消崛起国实力增长带来的结构压力, 维持其在国际社会中的主导地位。然而, 联盟是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有效方式吗? 学界对于联盟有效性的既有研究并未展开充分讨论。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论述。第一部分对相关文献进行回顾与梳理; 在此基础上, 第二部分提出本文的分析框架; 第三部分以20世纪初英国结盟战略与七月危机为例, 进行案例分析; 最后对本文核心论点进行总结。

一、文献综述

权力转移之际, 处于相对衰落进程中的主导国, 为维持主导地位, 可能存在不同的战略选择, 例如在国内进行经济改革、加强军备等, 对外采取战略收缩、强化联盟体系等。一旦主导国决定实施联盟战略, 至少它相信联盟是有效的, 有助于维持其主导地位。需要指出的是, 当前学术界并未对联盟战略的有效性进行系统分析。但是, 由于一国采取联盟战略实质上已经暗示了联盟战略的效用, 否则采取联盟战略也就无从谈起。因此, 文献综述部分关注一国缘何采取联盟战略。

第一, 联盟战略是制衡权力的方式。在国际社会中, 国家之间的权力始终处于不平衡状态, 而且国家权力的变化加剧了国际社会权力分布的不稳定性。因此, 每当权力结构出现于己不利的变化时, 国家希望借助联盟改变这种状况。古典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 认为, 一切政治的政策谋求的不是保持权力, 便是扩大权力, 或显示权力。处于国际社会权力竞争中的国家, 为了保持和改善它们的相对权势地位, 通过联盟借助其他国家的实力以加强本身的实力。因而, 联盟战略具

① [古希腊]修昔底德著, 谢德风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 商务印书馆, 1985年版, 第21-111页。

②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Feb. 2015, pp.24-25, https://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docs/2015_national_security_strategy.pdf.

③ 黄宏伟:“美国六位大使公开信:不要把亚太地区领袖地位让给中国”, 观察者网, 2017年1月18日, http://www.guancha.cn/america/2017_01_18_389986_2.shtml。

④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ashington, D.C., Dec. 2017, p.45,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2.pdf>.

⑤ 李开盛担忧中美之间由于第三方因素引发中美间接性结构冲突。参见:李开盛:“间接性结构冲突——第三方引发的中美危机及其管控”,《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5年第7期, 第90-106页。

⑥ 阎学通著:《历史的惯性:未来十年的中国与世界》, 中信出版社, 2013年版; 杨原:“崛起国如何与霸权国争夺小国? ——基于古代东亚历史的案例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2年第12期, 第26-52页。

有相当的灵活性,依据国际社会权力结构的变化而变化。每当均势似乎遭到破坏,或者需要重新组合力量恢复均势时,君主们会不可避免地改变阵营,抛弃旧联盟,组成新联盟。^①一些现实主义学者偏好从国家安全角度分析联盟的缔结。沃尔兹(Kenneth N. Waltz)认为,国家寻求权力的制衡,而非权力的最大化。国家很少能够负担得起以实现权力最大化为目标所带来的代价。^②国家缔结联盟只是出于安全的考虑,通过缔结联盟改善它们所处的安全环境。一国与对手军事能力差距越大,与对手冲突越激烈,联盟需要也就越强烈,它从满足这种需要的联盟中获取的威慑和防御的收益也就越大。然而,实力不同的国家满足这种需要的程度不同。一个军事力量太弱的盟友不能满足其能力差距,仅能提供微不足道的安全收益。另一方面,一个强大的盟友可能提供更多的安全,但可以主导联盟。^③当然,联盟并不一定意味着安全。历史经验表明,联盟不仅不能阻止战争或促进和平。反之,联盟与战争爆发相关。由于联盟会引起反制联盟,特定的联盟并不足以增强力量或增进安全。^④

第二,联盟战略是制衡威胁的方式。尽管在国际关系中,权力非常重要,但是只有权力与意图结合才能真正产生作用。国家倾向与构成最严重威胁的国家结盟或对抗,构成威胁的因素主要有:综合实力、地缘的毗邻性、进攻实力和侵略意图等。这些因素中任何一个发生变化,都将改变国家对外来威胁的认知。^⑤一国面临着外部威胁的变化会导致不同的战略行为。如果一国面临外部威胁水平高,则倾向于选择强义务的多边联盟战略;如果一国面临外部威胁水平低,则倾向于选择弱义务的双边联盟。^⑥也有学者指出,当外部威胁程度较低时,一国可能选择与对手结盟,通过缔结束缚性的联盟,管理联盟间的内部威胁。但是,当外部威胁的程度不断提升时,该国选择通过缔结联盟制衡对手,甚至采取追随战略与对手结盟。^⑦换言之,不同的威胁程度决定了一国采取联盟战略的差异。

第三,联盟战略是制衡利益的方式。如果说权力制衡和威胁制衡暗示了国际关系中的制

衡是普遍现象,利益制衡则指出追随才是普遍的战略行为。在国际社会中,每一个国家的偏好存在差异,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维持现状的国家,以安全最大化为目标;另一类是修正主义国家,以权力最大化为目标。尽管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特性会对国家的联盟行为产生一定的约束力,但是决定国家联盟行为的更重要因素是利益。国家更关注谁拥有权力,而非权力的不平衡。利益而非权力,决定了国家如何选择敌友。^⑧当然,对于利益的衡量存在分歧,尤其是大国与小国的利益诉求存在差异。斯奈德(Glenn H. Snyder)指出,如果收益大于成本,国家缔结或加入联盟。成本主要是对盟友的承诺牺牲了自主性。收益则包括:增强对自己攻击的威慑力;增强对自己攻击的防御能力;增强对盟友攻击的威慑力;联盟不仅将伙伴与自己捆绑在一起,满足了盟友的安全需求,缓和了彼

① [美]汉斯·摩根索著,徐昕、郝望、李保平译:《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2页;第238-239页;第250-251页。

②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ddison-Wesley, 1979, p.127.

③ Glenn H. Snyder, "Alliance Theory: A Neorealist First Cu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44, No. 1, 1990, p.111.

④ Glenn Sny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Vol. 36, No. 4, 1984, pp. 461-495; Dan Reiter, "Learning, Realism, and Alliances: The Weight of the Shadow of the Past", *World Politics*, Vol. 46, No. 4, 1994, pp. 490-526; Douglas M. Gibling and John A. Vasquez, "Uncovering the Dangerous Alliances, 1495-1980",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2, No. 4, 1998, pp. 785-807; Woosang Kim, "Power Parity, Alliance, Dissatisfaction, and Wars in East Asia, 1860-1993",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6, No. 5, 2002, pp. 654-671.

⑤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21-26; Stephen M. Walt, "Why Alliance Endure and Collapse", *Survival*, Vol. 39, No. 1, 1997, p. 158.

⑥ 肖斌著:《制衡威胁——大国联盟战略的决策行为》,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版,第126-128页。

⑦ Patricia A. Weitsman, "Alliance Cohesion and Coalition Warfare the Central Powers and Triple", *Security Studies*, Vol. 12, No. 3, 2003, pp. 79-113; Patricia A. Weitsman, *Dangerous Alliances: Proponents of Peace, Weapons of War*,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7-24.

⑧ Randall L. Schweller, *Deadly Imbalances: Tripolarity and Hitler's Strategy of World Conquest*,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Randall L. 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1, 1994, pp. 72-107.

此的安全担忧;还排除了盟友之间战争的可能性;增强了对结盟国家的控制或影响。^①

理性的国家行为体,通过成本与收益的计算,决定是否选择联盟战略。一国是否是修正主义国家还是维持现状国家往往难以做出清晰区分。吉尔平(Robert Gilpin)指出,国际社会中的每一个国家都是修正主义国家,每一个群体或国家期望变革国际体系以谋求更多的自身利益,制约这种诉求的努力在于收益与成本之间的差距。^② 国家寻求改变现状只存在程度和时间的差异。因为一国可能在某些国际问题上寻求改变现状,而在另一些问题则寻求维持现状;一国可能在某一个阶段总体上试图改变现状,而在另一阶段试图维持现状。

第四,联盟战略是管理盟友的方式。信息不畅通常被认为是战争的重要原因之一。杰维斯(Robert Jervis)认为,历史上某些战争本可以避免,但是由于决策者的错误知觉导致了战争爆发。勒博(Richard Neb Lebow)分析了国际政治中错误知觉的来源:官僚政治、国内政治、国家自我意象。^③ 于是,一些学者提出,通过缔结联盟可以为各国提供可靠的信息,更充分掌握联盟内关于成员军事能力的信息,降低了因误解导致战争的可能性。出于管理盟友之间冲突而缔结的联盟,可以管理彼此冲突,约束盟友,发展与盟友之间的友好关系。^④ 联盟如同制度,在外部威胁消失时,依然可以适应变化了的环境。^⑤ 不过,在实力相近的国家联盟中,联盟提供的信息非常重要,能降低彼此之间爆发冲突的可能性。而在实力差距较大的联盟中,潜在军事冲突爆发的可能性是相对固定的,联盟提供信息发挥的作用不大。^⑥ 这也就暗示了权力转移进程中,主导国与崛起国可以通过结盟方式管理彼此间的冲突。但是历史上,主导国与崛起国在和平时期结盟的案例匮乏。

国家为何结盟,学术界已经进行了较多的探讨。无论是出于制衡权力、威胁、利益,还是管理盟友之间关系,都暗示了联盟战略的效用。然而,学界并未充分讨论这一效用的机制。在权力转移进程中,主导国选择联盟战略维持主

导地位则意味着承认联盟战略是有效地实现战略目标的方式。

二、权力转移、联盟战略与主导地位的分析框架

任何对于联盟的研究首先应当回答联盟是什么。简单地说,联盟必然超出一国的范畴,至少有两个国际体系中的成员,通常以书面条约的形式,规定盟友间彼此承担军事义务。^⑦ 联盟建立在国家之间书面的、多数是自愿的政治协议、条约或公约之上,这些国家保证在军事冲突的突发事件中,协调他们的行为和政策。^⑧ 一般在条约中具体规定,明确承诺生效的具体条件,以及应对特定情况时,一致同意采取某种行动。^⑨ 因此,联盟是两国或更多国家之间,为维护

^① Glenn H. Snyder, *Alliance Politic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43-44.

^②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50-51.

^③ 参见[美]罗伯特·杰维斯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Richard Neb Lebow, *Between Peace and War: The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Crisis*,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148-228.

^④ Patricia A. Weitsman, "Intimate Enemies: The Politics of Peacetime Alliances", *Security Studies*, Vol.7, No.1, 1997, pp.156-193.

^⑤ Celeste A. Wallander, "Institutional Assets and Adaptability: NATO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4, No.4, 2000, pp.705-735.

^⑥ David H. Bearce, Kristen M. Flanagan and Katharine M. Floros, "Alliances, Internal Information Conflict among Member-Stat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60, No.3, 2006, pp.595-625.

^⑦ Glenn H. Snyder, "Alliance Theory: A Neorealist First Cu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44, No.1, 1990, pp.103-123; Douglas M. Gibling and Meredith Reid Sarkees, "Measuring Alliances: The Correlates of War Formal Interstate Alliance Dataset, 1816-2000",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41, No.2, 2004, pp.212-222; James D. Morrow, "Alliances: Why Write Them Down?",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s Science*, Vol.3, No.1, 2000, pp.63-83.

^⑧ Volker Krause and J. David Singer, "Minor Powers, Alliances, and Armed Conflict: Some Preliminary Patterns", in Erich Reiter and Heinz Gärtner eds., *Small States and Alliances*, Springer, 2001, p.16.

^⑨ Mark J. C. Crescenzi, Jacob D. Kathman, Katja B. Kleinberg and Reed M. Wood, "Reliability, Reputation, and Alliance Forma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6, No. 2, 2012, p.262.

成员国安全、增强成员国权力,应对外部威胁或挑战时,做出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军事承诺。由于承诺具有差异,联盟可以是进攻性的也可以是防御性的;可以是单方面保证也可以是相互承诺。军事联盟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防御条约。它要求签字国在与敌国军事对抗时,以军事力量帮助盟友,进行干预。第二,非侵略/中立条约。它要求签字国承诺不诉诸军事行动反对任何盟友。第三,谅解。它要求签字国仅仅同意在军事冲突事件中保持彼此磋商。^①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联盟是国际关系中常见的现象。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联盟,都是一国外交政策的实践活动,是一国实现战略目标的工具之一。

一般而言,缔结联盟的国家希望联盟是可靠的,只有可靠的联盟才能更好地实现战略目标,但是联盟的可靠性与联盟的有效性并不等同。联盟是否可靠是当前联盟研究的热点之一。现实主义学者怀疑一切诸如制度、条约等对国家间关系的约束力。^② 不过有学者通过统计发现,大约74.5%的联盟是可靠的。^③ 也有学者指出,制度设计越完善的联盟越可靠。^④ 但是,可靠的联盟并不总是有效的联盟,因为情势的变化会导致实现目标条件的变化。美国肯尼迪(John F. Kennedy)总统时期的国务卿腊斯克(Dean Rusk)和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Robert S. McNamara)两人都认为丧失南越将破坏《东南亚条约组织》,损害美国对其他盟友承诺的可靠性。^⑤ 但美国最终不得不放弃南越。这证明了联盟的不可靠,但这既没有影响美国与苏联对抗的战略目标,也没有损害欧洲国家对于美国承诺的信心。1939年,苏联与德国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缔结联盟。事后证明,这个联盟并不可靠。但于苏联而言,却达到了延迟德国进攻的战略目标。因此,分析联盟有效性必须结合一国缔结联盟时的战略目标加以考察。

有效性是决策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预期的战略目标。一国决定缔结联盟的初衷总是出于某种政治目的而做出战略抉择。一旦联盟形成之后,可能随着时间、条件的变化,一国无需结盟或无需继续履行盟约亦可实现此种政治目

的。换言之,当盟友需要其履行盟约时,随着条件的变化,一国无须履约即可以实现其政治目的。另一种情况则是,一国为了某种政治目的而缔结联盟,但随着时间、条件的变化,即便履行盟约,亦无法实现其政治目的。本文所要探讨的是,权力转移之际,主导国采取联盟战略,能否维持其主导地位?

2.1 结构压力与联盟需求

权力转移是国际关系中亘古未变的规律,激发了国际关系学者持续不断的兴趣。所谓权力转移,是指在既定国际结构中,主导国地位下降,崛起国地位上升并超越主导国的权力变化的进程。权力转移不仅是主导国和崛起国力量消长的变化,而且是崛起国取代衰落的主导国主导地位的历史进程。然而,从国际关系史来看,没有一个主导国愿意将主导地位拱手相让。吉尔平认为,为了维持主导地位,当衰落的主导国还拥有军事优势的时候,它通常发动防御性战争来击败或削弱崛起国。当面临衰落和战争之间的选择时,政治家大多选择战争。^⑥ 从历史的观点看,泰勒(A. J. P. Taylor)将1848—1918年间的大国战争都作为预防性发动的战争。^⑦

^① Michael F. Altfeld, "The Decision to Ally: A Theory and Test", *The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Vol. 37, No. 4, 1984, p.530; Volker Krause and J. David Singer, "Minor Powers, Alliances, and Armed Conflict: Some Preliminary Patterns", in Erich Reiter and Heinz Gartner eds., *Small States and Alliances*, Springer, 2001, p.17.

^② John J. Mearsheimer,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9, No.3, 1995, pp.5-49.

^③ Brett Ashley Leeds, Andrew G. Long and Sara McLaughlin Mitchell, "Reevaluating Alliance Reliability Specific Threats, Specific Promises",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4, No. 5, 2000, pp.686-699.

^④ Geoffrey P. R. Wallace, "Alliances, Institutional Design, and the Determinants of Military Strategy",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Vol.25, No.3, 2008, pp.224-243; 董柞社:“联盟类型、机制设置与联盟可靠性”,《当代亚太》,2014年第1期,第71-94页。

^⑤ Gregory D. Miller, "Hypotheses on Reputation: Alliance Choices and the Shadow of the Past", *Security Studies*, Vol.12, No.3, 2003, pp.40-41.

^⑥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191.

^⑦ A. J. P. Taylor,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 1848-1918*, Clarendon Press, 1954, p.166.

一个面临衰落威胁或正在衰落的、仍处于支配地位的军事强国更有可能发动战争,因为它既有能力、又有意愿发动战争,任何一场大战都必然是“预防性战争”。^①在权力转移进程中,主导国寻求以某种方式继续维持主导地位。

所谓主导国是指比其他大国更加强大的大国。而崛起国是指那些试图获得大国地位,并被同期的其他国家认可为处于崛起状态中的国家。^②因而,主导国通常指权力最强大的国家,而崛起国则可能是一定时期内权力快速增长的一个或几个国家。主导国在国际权力结构中的地位,是指该国获得了这样一种权威,能够提供一种政治秩序换取其他附属国的服从与合法性。^③这就要求主导国不仅在经济、军事和科技等物质性权力上拥有优势,而且能够在国际秩序中施加强大的政治影响力。

由于国家之间的权力增长是不平衡的,国家之间权力对比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在权力转移进程中,国际体系中权力对比出现不利于主导国的动态变化,给主导国带来了越来越大的结构压力。所谓结构压力,实际上是一个大国在国际权力结构中的位置对其安全带来的压力。^④依据沃尔兹的观点,国际政治结构依据排列原则、单元的特性、能力的分配进行定义。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下,系统单元(国家)在功能上不存在差别;因此,最重要的就是依据单元(国家)能力大小加以区分。^⑤国际权力结构制约了国家的行为,而国家对于国际政治权力结构的变化十分敏感。一国在权力结构中位次升高,其安全压力下降;反之,一国在权力结构中位次下降,其安全压力上升。

漫长的国际关系史已经昭示,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始终位于国际权力结构的金字塔塔尖。尽管原因各异,但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避免盛极而衰的历史宿命。^⑥权力转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依据“权力转移理论”对权力转移进程的区分,可以将其分为三个阶段。权力转移理论认为,权力持平是主导国和崛起国之间权力对比关系接近的阶段,即崛起国和主导国的相对权力比率大致在4:5至6:5之间。^⑦权力转移持平阶

段之前可视为权力转移的起始阶段,持平之后可视为超越阶段。在权力转移的不同阶段,主导国面临的结构性压力是不同的,如表1所示。

表1 主导国的结构压力

	权力转移 起始阶段	权力转移 持平阶段	权力转移 超越阶段
主导国的结构压力	小	中	大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随着权力转移进程的深入,主导国的结构性压力增大,被迫在内部进行军事、经济和政治制度的革新,对外则降低成本维持与其资源保持平衡的国际义务。降低成本的方式之一即是,正在衰落的主导国对某些国家做出让步,与威胁性较小的国家结盟,共同分摊维持现状的成本,但让盟友分享现状的好处。^⑧崛起国的快速发展不仅给主导国带来了结构性压力,而且结构性压力也会传导给另外一些国家,尤其是崛起国周边的小国。一些小国由于其国力较小,在国际社会中存在脆弱性,其安全保障往往依靠霸权国家军事力量的支撑,以及由此形成的地区权力平衡体系。^⑨一旦崛起国实力增长并且日益逼近主导国之际,各小国也面临对外政策的调整、适应,这就给小国也带来了结构性压力。概

① Dale C. Copeland, *The Origins of Major War*,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15-16.

② Richard Ned Lebow, *Why Nations Fight: Past and Future Motives for Wa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99; p.101.

③ David A. Lake, *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9, p.94.

④ 刘丰:“结构压力、霸权正当性与制衡行为”,《国际政治科学》,2009年第3期,第10页。

⑤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ddison-Wesley, 1979, pp.88-99.

⑥ 对于霸权必衰的学理分析,存在各种争论的观点。参见:刘世强:“霸权依赖与领导国家权势衰落的逻辑”,《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5期,第21-41页。

⑦ Ronald L. Tammen, “The Organski Legacy: A Fifty-year Research Program”,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34, No.4, 2008, p.326.

⑧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pp.192-193.

⑨ 韦民:“规模、体系与小国脆弱性”,《国际政治研究》,2013年第1期,第76-81页。

而言之,权力转移之际,不仅主导国、而且一些小国同样面临着变化的结构压力。这就构成了主导国与小国联盟的共同环境和现实需求。

2.2 联盟战略与小国依赖

主导国与小国建立的联盟通常被视为不对称联盟。当联盟成员综合实力较为接近,且权力与责任之间大致相当时,此类联盟即构成对称联盟。当联盟成员综合实力差距较大,且权力与责任之间是不平等关系时,此类联盟即不对称联盟。在不对称联盟中,大国提供了安全,获得了自主性;弱国获得了安全,牺牲了自主性。因而,不对称联盟比对称联盟更易于缔结和维持。^① 在不对称联盟中,小国在安全条款上更加依赖盟友,因此不愿意冒终止盟约的风险。^② 与大国相比,联盟中的小国违背承诺的代价更加高昂,因为小国在安全中更加依赖大国。然而,真正的不对称联盟不能仅从权力差距加以分析,还必须关注联盟战略需求。如表2所示,随着主导国面临的结构压力越来越大,大国对于小国的战略依赖越来越强。一般而言,小国的战略是追随强者获益,其战略具有较大的灵活性。而大国迫切需要通过联盟战略阻止自身丧失主导地位。斯奈德据此提出,联盟需要是一国能力相对于最可能的敌国能力对比得出的结果,或者与想象对手的威胁能力对比的结果。与对手军事能力差距越大,与对手可能的冲突越激烈,一国的联盟需要也就越强烈。^③ 据此,战略依赖并不是依据盟友之间的力量对比得出,而是需要考察一国实现战略目标过程中,联盟战略的重要性。

表2 主导国的战略依赖

主导国结构压力	小	中	大
主导国战略依赖	弱	中	强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在权力转移进程中,尽管主导国可以通过与其他国家联盟的战略维持其主导地位,但是联盟成员的战略目标存在显著差异。任何一国对于缔结联盟、维持联盟的考虑都是从国家利

益出发。今天,美国在表面上为了盟友进行干预,但主要原因不是由于联盟承诺,而是决策者对美国国家利益的认知。^④ 联盟成员战略目标的差异也就埋下了联盟瓦解的隐患,也给了其他国家分化联盟的机会。面对一个潜在敌对的联盟,一国可以通过强制与奖励、威逼与利诱、胁迫与许诺等方式,分化对手联盟,促使对手联盟的成员在对抗时保持中立,甚至转而在对抗时支持自己或者让对手联盟成员加入自己领导的联盟。^⑤ 为预阻和分化对手联盟,一国常用的是楔子战略。楔子战略分化对手可以采取以下三种做法:一是缓和态势,降低对象国对自己的威胁认知,降低对象国的联盟需求强度,进而也导致其支付联盟成本的意愿下降;二是给予对象国一定的安全保证,防止其在主要对手施压或利诱后加入对手联盟;三是给予一定的经济或军事援助,使对象国的获利超出不结盟的损失,进而不愿结盟。^⑥

主导国对于联盟战略的依赖加深,必然采取措施防止联盟瓦解、增强联盟的凝聚力。所谓凝聚力是指各国目标一致性以及实现共同目标的战略能力。^⑦ 联盟的凝聚力越强,联盟的可靠性越高,对手分化联盟的难度越大。随着主导国相对衰落,联盟凝聚力存在潜在的风险,主导国不得不对盟友做出让步,以继续吸引盟友。其做法之一就是修改盟约,取悦潜在的伙伴,或

① James D. Morrow, "Alliances and Asymmetry: An Alternative to the Capability Aggregation Model of Allianc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5, No. 4, 1991, pp.904-933.

② Brett Ashley Leeds, "Alliance Reliability in Times of War: Explaining State Decisions to Violate Treati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7, No. 4, 2003, p.814.

③ Glenn H. Snyder, "Alliance Theory: A Neorealist First Cu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44, No.1, 1990, p.110.

④ Michael Beckley, "The Myth of Entangling Alliances Reassessing the Security Risks of U. S. Defense Pact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9, No. 4, 2015, p.47.

⑤ 刘丰:“分化对手联盟:战略、机制与案例”,《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1期,第48-65页。

⑥ 凌胜利:“楔子战略与联盟预阻”,《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7期,第77页。

⑦ Patricia A. Weitsman, *Dangerous Alliances: Proponents of Peace, Weapons of War*,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24.

是满足目前盟友的要求。^① 正如摩根索所言, 一个弱国所拥有的财产对于其强大的盟国来说, 其价值的珍贵程度很可能是无以替代的。在这种情况下, 弱国可以转让也可以不转让其独有的利益, 这使它在联盟中所处的地位非同一般, 超过了实质性权力的实际分配不一致的地位。^② 然而, 对于盟友需求的满足, 不但增加了主导国战略承诺的成本, 而且可能刺激盟友采取挑衅性行为, 增加了主导国牵连进不希望的风险。^③

2.3 联盟战略与牵连风险

依据权力转移理论, 在权力转移之际, 国际社会发生大战的几率非常高。崛起国常常被认为对于主导国建立的国际秩序不满, 在它们认为足够强大时会挑起与主导国的战争。权力转移理论不仅适用于全球层次, 而且适用于地区层次。^④ 但是, 勒博的研究表明, 崛起国和强国几乎不会发动针对主导国的战争。而主导国也不经常攻击大国, 它们更愿意通过进攻弱国来扩张或显示自身实力。^⑤ 勒博的结论指出了主导国与崛起国发动针对彼此战争的意愿较低, 但是并未否认主导国与崛起国之间战争的可能性。

在权力转移之际, 衰落中的主导国凭借联盟战略实现“实力聚合”, 维护主导地位。因此, 盟友对于衰落中的主导国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价值。由于小国在大国战略中价值的提升, 制约了大国在对外政策中的自主性, 增加了“牵连”进不必要的冲突的风险。甚至, 随着主导国对于小国的战略依赖到了一定强度, 联盟就类似于可以兑现的“空白支票”。

牵连是联盟政治中现实存在的风险。随着主导国对盟友的战略依赖加深, 给予盟友的自主性不断加大, 增加了主导国牵连的风险。主导国坚定地支持盟友, 鼓励了盟友在对外政策中采取更加冒险的行为。^⑥ 这就导致了斯奈德指出的联盟安全困境: 当决策者承诺保护盟友时, 他们可能能够威慑对手, 但是也可能被盟友骗入一场不希望的战争之中。^⑦ 国际社会中的

多数国家都同时兼具维持现状和修正主义的双重特性。主导国的盟友可能借助它的力量, 试图改变某些地区秩序或现状, 从而引发国际冲突。主导国最终发现, 它被迫卷入在战略上对其价值甚微的领土争端, 从而引发大国之间的冲突, 提高了卷入战争的风险。当前一些学者也担忧美国的安全承诺, 鼓励了大胆的盟友挑战更加强大的国家, 给美国带来巨大的风险。^⑧

主导国建构的联盟通常不仅仅是成员之间的双边或多边关系, 而且是处于复杂联盟网络结构中的一部分。简单地说, 当A国和B国并未结盟, 但是都与C国结盟时, 我们可以说, A国和B国处于联盟网络之中。现实情况可能复杂得多, 许多采取联盟战略的国家发现自身处于一个错综复杂的联盟网络结构之中。由于权力的影响, 主导国一旦采取联盟战略, 便成为“联盟网络”的中心。在联盟网络中, 主导国与盟友之间构成了“正式-法律型权威”, 而联盟网络结构的性质赋予了主导国对盟友的盟友“关系型权威”。^⑨ 研究表明, 联盟规模和成员国战争倾向之间存在某种关系。奥伦(Ido Oren)对1816—1980年之间缔结的126个大国联盟的战争记录数据进行分

①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ddison-Wesley, 1979, p.165.

② [美]汉斯·摩根索著, 徐昕、郝望、李保平译:《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第243页。

③ 左希迎:“承诺难题与美国亚太联盟转型”,《当代亚太》, 2015年第3期, 第4-28页。

④ Woosang Kim, “Power Transitions and Great Power War from Westphalia to Waterloo”, *World Politics*, Vol. 45, No. 1, 1992, pp.153-172; Douglas Lemke, *Regions of War and Pea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⑤ Richard N. Lebow, *Why Nations Fight: Past and Future Motives for Wa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124-125.

⑥ Glenn H. Snyder, “Alliance Theory: A Neorealist First Cu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44, No.1, 1990, p.113.

⑦ Glenn H. Sny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Vol.36, No.4, 1984, pp.461-495; Glenn H. Snyder, *Alliance Politic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307-308.

⑧ Michael Beckley, “The Myth of Entangling Alliances Reassessing the Security Risks of U. S. Defense Pact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9, No.4, 2015, p.16; David A. Lake, *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9, p.10.

⑨ 刘丰、董柞壮:“联盟网络与军事冲突: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考察”,《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5年第6期, 第72页。

析,表明联盟越大,其成员国卷入战争的可能性越大。^①也就是说,联盟网络结构越复杂,主导国卷入不愿意发生的冲突的风险越大。

在权力转移进程中,主导国对于盟友的战略依赖越深,联盟网络越复杂,主导国卷入不愿意发生冲突的风险越高。如表3所示,两种情况都增加了主导国卷入冲突的风险。一是主导国对于盟友的需求越来越深,给予盟友的自主性越来越大;二是主导国缔结的联盟网络越来越复杂,主导国管理盟友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当这两种因素叠加在一起的时候,主导国被迫卷入冲突的风险非常高。

表3 主导国牵连的风险

	小国战略自主性低	小国战略自主性高
联盟网络简单	低	高
联盟网络复杂	高	非常高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2.4 联盟战略的有效性

事实上,主导地位与联盟战略存在内在的矛盾性。国际社会,主导国主导地位是体系性的,而非仅仅作用于体系中的一部分。即主导国要能够为体系内的其他国家提供诸如安全、经济秩序等公益。依据其构建的规范、规则、制度,主导国对国际社会中的某些事件、冲突和危机进行评判和裁决,确保其权威不受影响。但是联盟战略则意味着,主导国介入争端时必然受到争端一方是否是其盟友的身份的影响。而且,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特性迫使一国对于其他国家的意图做出最坏的假设。结果,一国采取诸如缔结或强化联盟的方式改善安全,可能让未来潜在的对手变成今天确定的对手。主导国的联盟战略往往是在制造对手。

有效性是指决策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预期的战略目标。任何决策都具有目的性,而有效性指方式与目标的匹配。主导国联盟战略的出发点是维持主导地位,因此联盟战略有效性的核心在于这一战略是否维护了主导国的主导地位。即这一战略是否有助于主导国以既有的国际秩序,规

则约束各国的行为,和平解决各类国际冲突,尤其避免与其他大国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

从理论上,维护主导地位的有效性就要避免国际社会发生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尤其是主导国与崛起国的大战。沃尔兹指出,使用武力是维持主导地位的最后手段,但也是丧失主导地位的开始。主导国运用权力来维持秩序,一旦使用武力则标志着崩溃的可能。^②战争对于主导国而言意味着巨大的风险,如果失败,可能加速各个战线的失利;即便获胜,代价高昂的成本可能使其进入脆弱时刻。^③何况,战争并不能解决权力转移问题,因为多数战争并不能明显地降低被征服国家权力的基本来源: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口。^④战争一方面破坏了主导国建构的国际秩序,另一方面也无法阻止主导国继续衰落的进程。

从历史来看,国际关系史给出的答案是,大战的爆发意味着主导国主导地位丧失的开始。阿利森(Graham Allison)统计了历史上16次权力转移,其中发生了12场大战。最近的大战即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战争彻底断送了英国的主导地位。之前爆发的多次战争中,主导国获胜并延续较长时间主导地位的,只有拿破仑战争和克里米亚战争中的主导国英国。但是从权力转移的角度看,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实力几乎是法国的3倍;克里米亚战争时期,英国实力是俄罗斯的2倍多,这两场战争很难称得上是势均力敌的权力转移战争。而在其他几场大战后,主导国的主导地位都未曾获得有效延续。^⑤

① Ido Oren, "The War Proneness of Alliances",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34, No. 2, 1990, pp.208-233.

②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ddison-Wesley, 1979, pp.185-186.

③ Jack S. Levy, "Declining Power and the Preventive Motive for War", *World Politics*, Vol.40, No.1, 1987, pp.82-107.

④ Richard Ned Lebow, *Why Nations Fight: Past and Future Motives for Wa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41.

⑤ Graham Allison, "Thucydides Trap Case File 16 Major Cases of Rise VS. Rule", Presentation, Sept. 23, 2015, http://belfercenter.hks.harvard.edu/publication/24928/thucydides_trap_case_file.html; 对英国、法国、俄罗斯实力的衡量使用战争相关因素数据库数据,参见:National Material Capabilities Data Documentation Version 4.0, The Correlates of War Project, <http://www.correlatesofwar.org/>.

联盟战略对于维持主导地位的大国而言,这并非一个有效的战略抉择。

本文以“一战”前夕英国的联盟战略作为研究案例,分析联盟战略在维持主导地位中的有效性。之所以选择这一案例,第一,这是距离我们最近的较完整的研究案例,能够为理解当下国际关系提供启示。尽管当今美国采取联盟维持其霸权地位,但在国际权力结构中,美国依然具有明显的优势,所以并不是经验研究的最佳案例。第二,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处于相对衰落进程中,并且在20世纪初从传统的均势转向联盟战略,对于考察权力转移之际联盟战略的效用具有典型意义。第三,案例研究的相对优势在于发现新的变量和假说,明晰因果关系及其机制、内部的有效性和经验的有效性。^①基于此,本文选择20世纪初英国联盟战略进行案例研究,以验证本文的理论分析。

三、英国联盟战略与七月危机

19世纪末英国处于权力巅峰,但也是权力衰落的开始。为了维持全球主导地位,英国在20世纪初放弃了光荣孤立政策,转向联盟战略。然而,随着权力相对衰落,英国对盟友,尤其是法国的战略依赖不断加深,其外交政策失去了灵活性。英国的联盟战略令欧洲本已存在的联盟网络更加复杂,逐渐形成了以英国和德国为中心的两大联盟网络,许多地区层次的国际危机都间接影响了英国与德国的关系,大大增加了大国冲突的可能性。七月危机的爆发将所有欧洲大国都卷入到一场大战之中,英国赢得了一场惨胜,但却加速了相对衰落的进程,曾经的荣耀一去不返。

3.1 结构压力与联盟战略

19世纪末期英国权力达到顶点。1900年的英国是世界上从未有过的最大帝国,号称“日不落帝国”。大英帝国幅员辽阔,影响力遍及全球各个角落。其国土面积大约为1200万平方英里,拥有大约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在此前

的30年内,大英帝国增加了425万平方英里的领土和6600万人口。英国皇家海军实力相当于仅次于它的两个最强大舰队之和;此外,英国遍布全球的海军基地和电缆通信站网;拥有世界最大的商船队;伦敦的金融服务业务使英国成为全球经济的最大投资者、银行家、保险商和商人。^②大英帝国的全球扩张在20世纪初已经发展到了顶峰。

顶峰即是危机。英国权力到达顶峰之际,实际蕴含了巨大的危机。在19世纪末,英国在工业生产总值上已经被美国超越。在20世纪初,德国的钢铁产量也已经超过了英国。英国尽管仍然处于世界权力金字塔的顶端,但是已经出现衰落的迹象。如表4所示,在1900年,英国在国家综合能力指数上已经落后于美国。德国的整体实力也在快速增长,尤其是德国的海军建设对于英国造成极大的心理压力。尽管在海军整体实力上,英国依然具有优势,但是它已经意识到,面对19世纪末世界各大国的海军建设,英国开始丧失对海洋的控制力。要加强一个地区的海军力量,就必然削弱另一个地方的海军力量。^③

表4 二十世纪初主要大国国家能力综合指数

	英国	法国	俄国	德国	奥匈	美国
1900年	0.177 528	0.074 714	0.109 239	0.131 525	0.042 399	0.187 999
1904年	0.134 843	0.070 254	0.113 234	0.133 757	0.042 103	0.204 946
1907年	0.121 878	0.070 361	0.119 475	0.135 903	0.041 993	0.227 735
1913年	0.112 750	0.068 046	0.116 147	0.143 321	0.044 730	0.219 916

数据来源:National Material Capabilities Data Documentation, Version 4.0。

在大英帝国的扩张进程中,也日益遭受其他强国的抵制。英国在西半球的利益遇到崛起中美国的冲击,双方在美洲地区展开了激烈的较量,最终以英国承认美国在美洲的主导地位而告终;英国在近东和波斯湾地区的利益,受到

① 刘丰:“实证主义国际关系研究:对内部与外部论证的评述”,《外交评论》,2006年第5期,第98页。

②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Great Powers*, Unwin & Hyman, 1988, p.226.

③ 同②, p.227。

俄国不断扩张的压力,俄国甚至威胁到了英国在印度次大陆的利益;在非洲,英国面临着法国和德国的竞争;德国在欧洲中部的崛起,对欧洲大陆的传统均势形成了巨大冲击。在相对衰落之际,英国面临的结构压力不断增大,势必在对外战略上做出一定的调整。

长期以来,英国的战略目标就是维护全球的主导地位。在此战略目标下有两个关键问题:第一,保证通向大英帝国最遥远角落的航道畅通无阻;第二,防止任何一国主宰欧洲大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英国扮演了平衡者的作用,利用自身的重量保持天平的平衡,阻止欧洲大陆崛起这样一个大国。^① 为了维护主导地位,英国实行“光荣孤立”政策,试图与欧洲各国保持一定的距离,以此确保英国的行动自由。但是,随着结构压力不断增大,英国开始放弃传统的政策,转而走向结盟之路。1900年10月,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Lord Salisbury)因健康原因辞去外相兼职,专任首相。继任的外相兰斯多恩爵士(Lord Lansdowne)与殖民大臣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一样,认为英国无法再以光荣孤立保障本土安全。^② 英国开始在外交领域试探结盟的可能性。

随着欧洲形势的发展,英国领导人开始寻求合适的盟友,先后与两个潜在伙伴进行结盟谈判:德国和日本。但是在与德国的缔约谈判中,英国建议缔结一个关于远东的地区性同盟,而德国则希望建立英国与三国同盟之间的全面联盟,由于目标的差距导致谈判失败。1902年,英国与日本联盟。两国同意,若其中一国因中国或朝鲜而与第三国发生战争,则另一国将保持中立。但若一国同时受到两个敌国的攻击,则另一国有义务提供帮助。英国领导人希望借助日本,对抗俄国在远东的扩张,减轻英国在远东的战略负担。

19世纪末,法国意识到在俄国力量陷入远东的情况下,法俄联盟并不能有效对抗德国的崛起,于是希望与英国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法国主动在1899年法绍达事件中做出让步。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英国也开

始安抚法国,担忧法国卷入冲突,避免英国因为与日本的联盟关系而卷入远东冲突。在经过谈判之后,1904年4月,英法之间正式签署《英法协约》。英法两国关系开始全面缓和。英国随之进行兵力调整,把原来分布在英国许多殖民地的、主要分布在地中海的大约160艘军舰集结到本国水域,集中到紧靠德国的海军基地里;同时还加快修筑面对德国海岸的大型海军基地和设施。^③ 随着英法关系改善,英国开始考虑新的对俄政策。日俄战争之后,俄国开始在远东收缩,准备回到欧洲和近东。在法国的斡旋下,英俄经过谈判,于1907年8月31日签署《英俄协定》,解决两国在殖民地问题上的分歧。至此,英国彻底终结了光荣孤立政策,试图以联盟战略维持主导地位。

3.2 20世纪初欧洲的联盟网络

除了英国的联盟战略外,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各国之间存在广泛的联盟关系。1873年5月初,德国皇帝访问俄国,在这次访问中,德国与俄国签订军事协约。6月,俄国皇帝在维也纳与奥匈皇帝达成《兴勃隆协定》,10月,德国皇帝访问维也纳并加入这一协定。

1879年10月7日,德国与奥匈签订同盟条约,共同对抗来自俄国或俄国支持的国家发动的侵略。但是德国依然希望改善与俄国的关系。俄国此时的主要对手是英国而非德国。于是在德国的压力下,奥匈再次与德国和俄国签订了《三皇同盟条约》。1887年,三皇同盟条约期满,德国提议用德俄双边协定取代三皇同盟。6月,两国签订条约(史称《再保险条约》),协调两国在欧洲的利益。

1881年,法国入侵北非的突尼斯,引起了长期觊觎非洲的意大利的不满。于是,意大利寻

① [美]罗伯特·J. 利伯著:《英国:衰落与复兴》,载[美]罗伯特·A. 帕斯特编,胡利平、杨韵琴译:《世纪之旅:七大国百年外交风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7-38页。

② Henry Kissinger, *Diplomacy*, Simon & Schuster, 1994, p.186.

③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三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340页。

求与德国和奥匈的联盟。1882年5月20日,德奥意三国在维也纳签订了同盟条约。1887年2月,德国、奥匈、意大利签署《三国同盟续约》进一步协调三国在边界、近东和海上的利益。

为了打破德国在欧洲建立的联盟包围圈,法国利用经济贷款拉拢俄国,博得了俄国的好感。1891年,两国开始进行联盟谈判,并于次年8月签订了《法俄军事协定》。该协定规定:如果法国或俄国受到来自德国或德国支持下的意大利、奥匈的进攻,另一国予以援助;如果三国同盟的成员进行了军事动员,法俄毋需商议,立即动员军队;并规定了在军事行动中双方参战的军事力量。经过两国政府批准,法俄正式缔结针对德、奥的联盟。这一联盟加强了两大联盟集团的对抗,引发了以军事手段而非外交方式解决悬而未决的冲突。^① 1899年,法俄两国将此条约修改为无限期。1902年11月,法国又与意大利订立中立协定,减轻了来自意大利的压力。

1911年的第二次摩洛哥危机中,德国军舰进入阿加迪尔港引起了英国和法国的强烈反应。这一事件后,英国开始与法国加紧军事合作,其分析,在新形势下,如果与德国发生战争时,英国陆军如何参加法国陆军在东北地区的作战。^② 英国与法国、俄国缔结联盟之初是希望缓和盟友之间的关系。但是随着结构压力增大,英国对法国、俄国的战略依赖加深,协约国联盟的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如表5所示,尽管英国最初希望利用联盟的方式约束法国和俄国,协调双方之间的关系。但是随着结构压力增大,协约国联盟转而针对外部威胁,其凝聚力进一步增强。

表5 英、法、俄联盟的威胁来源与凝聚力

	威胁的主要来源	联盟凝聚力
法俄联盟	外部	高
协约国联盟	最初内部协调,最终外部威胁	最初低,最终更高

资料来源: Patricia A. Weitsman, *Dangerous Alliances: Proponent's of Peace, Weapons of War*,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135.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的联盟关系发展至“一战”前夕,几乎将各大国均卷入其中。如表6所示,欧洲已经形成了以英国为首和以德国为首的联盟网络。几乎所有欧洲问题的解决,都依赖两大集团中的大国协调。由英国、法国、俄国、德国、奥匈和意大利等大国进行调停并决定最终的安排。

表6 二十世纪初欧洲的联盟网络

序号	联盟	缔约日期	结束日期	盟约性质
1	德、奥联盟	1879.10.7	1918.11.3	防御/中立
2	德、奥、意同盟	1882.5.20	1918.11.3/1915.5.3	防御
3	德、奥、意、罗马尼亚同盟	1883.10.30	1918.11.3/1915.5.23 /1916.8.16	防御/谅解
4	德、奥、意、罗马尼亚同盟	1888.5.15	1915.5.23	防御/谅解
5	法、俄联盟	1893.12.27	1917.11.8	防御
6	英、日联盟	1902.1.30	1921.12.13	防御/中立/ 谅解
7	法、意联盟	1902.11.1	1918.11.15	中立
8	英、法、西联盟	1907.5.16	1915.4.26	谅解
9	俄、意联盟	1909.10.24	1917.8.11	谅解
10	俄、日联盟	1910.7.4	1916.7.3	谅解
11	英、法联盟	1912.11.23	1918.11.11	谅解
12	塞尔维亚、希腊联盟	1913.5.19	1918.11.11	防御/中立

数据来源: Alliances data .csv, <http://www.correlatesofwar.org/data-sets/formal-alliances>.

除了正式的联盟关系,当时欧洲各小国也纷纷寻求大国的庇护,一些小国与大国形成了非正式的联盟关系。1912年3月,第一次土耳其战争,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建立了反对土耳其的巴尔干联盟,希腊随后加入。1913年,第二次土耳其战争之后,俄国控制了塞尔维亚、希腊、罗马尼亚、门的内哥罗联盟;保加利亚和土耳其则倒向了德国。这就令当时欧洲的联盟网

^① Patricia A. Weitsman, *Dangerous Alliances: Proponents of Peace, Weapons of War*,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118.

^② [美]西德尼·费著,于熙俭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上),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30页。

络更趋复杂。

3.3 七月危机与联盟牵连

1914年6月28日,奥匈皇储费迪南德(Franz Ferdinand)在萨拉热窝遇刺身亡,迅速引发了奥匈与塞尔维亚之间的危机。英国对于奥匈与塞尔维亚之间的冲突并没有过多的利益诉求,但是随着相对权力衰落,对于盟友的战略依赖加深,加之欧洲复杂的联盟网络,卷入到一场本不希望发生的战争之中,最终加剧了相对衰落进程。

七月危机之初,英国并不关心奥匈与塞尔维亚之间的冲突。在刺杀事件发生之后,英国的《曼彻斯特卫报》非常明确地宣称,曼彻斯特对贝尔格莱德漠不关心,如同贝尔格莱德对曼彻斯特一样。^①作为世界主导国,英国的态度是至关重要的。但是,英国一方面不想为了塞尔维亚而冒与德国交战的风险。7月9日,德国驻英国大使里奇诺斯基(Karl Prince von Lichnowsky)曾拜会英国外交大臣格雷(Sir Edward Grey),询问英国对于奥匈与塞尔维亚危机的意见。格雷表示,英国与法国、俄国之间没有秘密协议,如果欧洲爆发战争,英国不承担义务。^②另一方面,英国担忧盟友的离心离德,无法向法、俄施加压力,约束盟友的行为。直到7月31日,法国驻英国大使康朋(Paul Cambon)向国内汇报了与格雷会谈的情况,表示英国政府不能向法国保证干预。^③

七月危机爆发于奥匈与塞尔维亚之间,原本是一场地区冲突。但塞尔维亚的背后是俄国,俄国的背后是法国,法国又是英国必须依赖的盟友。在七月危机中,法国非常明确,无论在欧洲发生何种战争,都将支持俄国。^④出于两面夹击德国的需要,法国需要俄国。1912年9月,时任法国总理普恩加莱(Raymond Poincaré)向俄国外交大臣沙佐诺夫(Sergei D. Sazonov)承诺,在俄国和其他中欧国家的战争中,法国将毫不犹豫地履行对俄国的条约义务。同年,法国还两次向俄国做出类似承诺。^⑤1914年7月20日至23日,已任总统普恩加莱访问俄国,进一

步巩固了两国之间的关系。7月25日晚上,法国驻俄大使看到火车站非常热闹,火车里装满了军官和士兵。他得出的结论是:“这次就是战争。”^⑥

俄国是七月危机中第一个主动卷入的大国。塞尔维亚1903年政变之后,成为俄国的势力范围。随着奥匈对塞尔维亚递交最后通牒的日期临近,俄国警告德国,要求奥匈不要对塞尔维亚提出过分要求,表示俄国不会对使塞尔维亚蒙羞的任何行动漠不关心。^⑦接到奥匈的最后通牒后,塞尔维亚表示如果没有俄国的帮助,塞尔维亚将不得不接受最后通牒。^⑧但是,俄国坚决反对塞尔维亚接受最后通牒。因而,7月25日,塞尔维亚国王宣布军事动员、政府转移、以部分接受的方式拒绝最后通牒。^⑨同日,俄国沙皇主持的御前会议决定批准针对奥匈的临时动员,俄国与德、奥边界地区进入“战争状态”。^⑩

在七月危机中,德国坚定支持奥匈帝国。在刺杀事件发生后,德国谴责了暗杀的实施者。7月5日下午,德国首相贝特曼(Theobald von Bethmann Hollweg)应召前往波茨坦,与德皇商议的结果是向奥匈保证,将根据条约所规定的义务和传统友谊,忠于奥方。^⑪面对欧洲日益形

① Christopher Clark, *The Sleepwalkers: How Europe Went to War in 1914*, Allen Lane, 2012, p.492.

② Gordon Martel, *The Month that Changed the World: July 1914*,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126.

③ Imanuel Geiss, *July 1914: The Outbreak of the First World War: Selected Documents*, W. W. Norton, 1967, p.327.

④ Jack S. Levy and Jack Snyder, “Correspondence: Everyone’s Favored Year for War—or No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9, No.4, 2015, p.209.

⑤ D. C. B. Lieven, *Russia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83, p.48.

⑥ [美]西德尼·费著,于熙俭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下),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47页。

⑦ 同③, pp.151-153.

⑧ Ludwig Reiners, *The Lamps Went Out in Europe*, the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1955, p.119.

⑨ 同⑤, pp.120-121.

⑩ 同④, pp.207-208.

⑪ Imanuel Geiss, *July 1914: The Outbreak of the First World War: Selected Documents*, W. W. Norton, 1967, pp.76-77; Joachim Remak, *The Origins of World War I 1871-1914*,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67, pp.105-106.

成的两大中心的联盟网络,德国需要获得奥匈的战略力量,应对两大联盟网络的权力变化。德国希望将危机保持在“地区化”层次上,利于奥匈帝国解决民族主义的威胁。但俄国的军事准备措施令德国的“地区化”政策破产。27日深夜,德国正式放弃一直采取的不妥协态度,向奥匈提出采取外交手段解决危机的要求,即止步于贝尔格莱德计划(Halt in Bergrade)。但提议姗姗来迟,已无力阻止事态恶化。

作为欧洲大国之一,奥匈帝国是萨拉热窝刺杀事件的受害者。7月3日,在奥皇发给德皇的信件中,认为刺杀事件关系到奥匈帝国的生死存亡,如果不做出强烈反应,将无法保持其大国地位。只要贝尔格莱德的这种罪恶的煽动根源不受到惩罚,所有欧洲君主国家的和平政策都将受到威胁。^① 奥匈知道塞尔维亚背后有俄国势力的支持,所以德国对于奥匈行动的支持至关重要。奥匈清楚,如果德国拒绝予以奥匈充分支持,德奥同盟的前景无疑将蒙上阴影。基于这一认知,奥匈预期在危急时刻,德国不会放弃奥匈;维持奥匈的大国地位符合德国的重要利益。^②

欧洲大陆之间复杂的联盟网络将大国的命运纠缠在一起。德国参谋总长毛奇(Helmuth von Moltke)在7月28日提交的一份备忘录中指出,奥匈针对塞尔维亚的军事行动,以俄国不干预为基础;如果俄国干预,俄奥冲突不可避免;德国也将不得不动员;接着法国会卷入其中。^③ 七月危机的发展正如其预料。7月28日,奥匈向塞尔维亚宣战。7月29日,沙皇在总动员计划上犹豫不决,但次日沙皇最终决定开始总动员。7月31日上午,俄国总动员的确切消息传到柏林。下午1点,德皇和贝特曼、毛奇及其他官员举行会议,决定宣布“即将来临的战争威胁”(Imminent danger of war)的状态。^④ 并向俄、法发去最后通牒,要求俄国停止动员、法国保持中立,并向英国做了通报。但法国于8月1日下午4点下达动员令。德国是在8月1日下午5时下令动员,在欧洲大陆各大国中,德国是最后采取这项极端的军事措施的国家。随着法国的

卷入,英国受联盟的牵连已不可能置身事外了。

1914年战争一旦开启,欧洲的联盟网络使得战争在除美国以外的大国快速传播。在权力政治的环境中,联盟体系正将各国决策推向一个方向而非其他方向。^⑤ 在七月危机中,如果奥匈进军,德国不得不跟进,否则奥匈帝国的解体将让德国单独位于中欧。法国与俄国的关系亦是如此。这样可怕的发展其实英国早有预测。在1912年12月初,英国曾预计,无论谁在巴尔干点燃一场冲突,俄国将挤入冲突,德国被迫卷入,法国不可避免地为帮助盟友而干预。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不能置身事外,任由法国被德国击败。^⑥ 未曾想,正如所料,英国最终被迫卷入了一场本不希望发生的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以英国、美国、法国为首的大国主导了战后世界秩序的安排。根据各自实力对比,经过斗争与妥协,各大国达成协议,构筑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经过“一战”之后,英国已经丧失了国际社会的主导地位。在政治领域,英国由19世纪的“英国治下”国际体系的主导者转为同法国、美国共享主导权,已经无法如19世纪那样制定灵活的光荣孤立政策,确保行动自由了。在军事领域,在1922年的《五国条约》中,英国被迫接受了与美国同等

^① Imanuel Geiss, *July 1914: The Outbreak of the First World War: Selected Documents*, W.W. Norton, 1967, pp.70-71; Samuel R. Williamson Jr. and Russel Van Wyk, *July 1914: Soldiers, Statesmen, and the Coming of the Great War, A Brief Documentary History*, St. Martin's, 2003, pp.97-98.

^② Konrad H. Jarausch, "The Illusion of Limited War: Chancellor Bethmann Hollweg's Calculated Risk, July 1914",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Vol.2, No.1, 1969, p.55.

^③ Imanuel Geiss, *July 1914: The Outbreak of the First World War: Selected Documents*, W.W. Norton, 1967, p.283; Samuel R. Williamson Jr. and Russel Van Wyk, *July 1914: Soldiers, Statesmen, and the Coming of the Great War, A Brief Documentary History*, St. Martin's, 2003, p.104.

^④ Holger H. Herwig, "Germany", In Richard F. Hamilton and Holger H. Herwig, eds., *The Origins of World War 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182.

^⑤ John A. Vasquez, "The First World Wa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 Review of Books on the 100th Anniversary",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6, No. 4, 2014, p.642.

^⑥ Christopher Clark, *The Sleepwalkers: How Europe Went to War in 1914*, Allen Lane, 2012, p.497.

的海上地位。这是英国对“一战”前“两强标准”政策的修改,是面临相对衰落时不得不接受的现实。在经济领域,英国对于金融领域的主导权也开始衰落,迟至1925年才勉强恢复金本位制,伦敦的金融中心地位也日益受到纽约的挑战。从国际规范看,19世纪英国主导的帝国主义发展模式已经受到极大挑战。“一战”后,不仅大英帝国统治下的殖民地出现了反抗浪潮,而且美国、苏联等大国也反对传统的殖民主义政策,帝国主义规范的合法性受到挑战。总之,从维持英国主导地位来看,20世纪初英国的联盟战略失败了,英国治下的霸权已经一去不复返。

四、结 论

本文试图解释的问题是,在权力转移的进程中,联盟战略是否是主导国维持主导地位的有效方式? 权力转移是国际关系中亘古不变的现象,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永盛不衰。但是也几乎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将主导地位拱手相让。在无政府状态下,联盟是一国实现目标的战略选择之一。无论是远在几千年前,还是当今的国际体系中,联盟都未曾缺席。当主导国试图以联盟战略维持主导地位时,可能加速主导国地位的丧失。一方面,权力转移作为一种进程,意味着主导国权力的相对衰落,为了维持主导地位,主导国对于盟友的战略依赖不断加深,增强了盟友的自主性,主导国约束盟友的难度加大;另一方面,国际关系中联盟网络的复杂化,增大了主导国卷入冲突的风险。当主导国被迫卷入到一场大战中,无论战场的胜负,主导国的衰落进程都将进一步加速。如果联盟战略是击败具体的国家,那么有可能成功。但是很不幸,出于挽救正在衰落中的主导国的主导地位,联盟战略注定是失败的,甚至加速了丧失主导地位

的进程。

19世纪末,英国已经达到权力的顶峰,但是它依然无法逃脱盛极而衰的宿命,不仅权力处于相对衰落之中,而且在世界各地的利益遭遇

诸大国的挑战。权衡之下,英国改变了“光荣孤立”的外交传统,转而寻求与日本的联盟,与法国、俄国达成谅解,协调彼此之间的关系。但是随着权力的相对衰落,英国面临的结构压力不断增长,对于法国、俄国的战略依赖加深,与法国、俄国的联盟关系由内部谅解转而变为针对外部威胁。与此同时,英国的联盟战略进一步将欧洲已经存在的联盟网络复杂化。欧洲逐渐形成了僵化的以英国为首和德国为首的两大联盟网络。七月危机原本不涉及英国核心利益,只是巴尔干地区冲突。但是随着塞尔维亚、俄国、法国等盟友先后卷入冲突,英国已经无法置身事外,被迫卷入了一场并不希望发生的冲突之中。需要指出的是,大战尽管不利于主导国维护主导地位,但是并不意味着对卷入冲突的崛起国有利,真正获益的可能是能够置身事外或卷入不深的其他大国。

美国在“二战”之后,运用联盟战略与苏联争夺世界霸权,在欧洲构建了北约联盟体系,在亚太地区构建了“轮辐”联盟体系。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在亚太地区强化联盟网络以维持主导地位。当前,有学者认为,美国开始衰落,中国国家权力在不久的将来会超越美国,在中美权力转移进程中,可能带来巨大的战争风险。^① 美国及其盟友维持现有国际秩序的意志和能力下降,与修正主义国家日益增长的改变国际秩序的欲望和能力交织,世界到了这样一个时刻:既有国际秩序崩溃,世界进入野蛮的无政府状态时期。为避免出现这种情况,美国依然需要联合欧洲和亚洲盟友的力量。^② 然而,当前美国在权力结构中依然处于领先地位,尤其在军事力量上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一些学者指出,中国拥有成为全球大国的潜在资源,是唯一能真

^① Graham Allison, “2014: Good Year for a Great War?”, *National Interest*, Jan. 1, 2014, <http://nationalinterest.org/commentary/2014-good-year-great-war-9652>.

^② Robert Kagan, “Backing into World War III: America Must Check the Assertive, Rising Powers of Russia and China before It’s Too Late, Accepting Spheres of Influence Is a Recipe for Disaster”, *Foreign Policy*, Feb. 6, 2017, <http://foreignpolicy.com/2017/02/06/backing-into-world-war-iii-russia-china-trump-obama/>.

正与美国匹敌的国家。但是目前在经济和军事上与美国差距较大,尤其是技术上非常落后,只是一个新出现的潜在的超级大国。在这个世界上,美国依然是未来几十年的唯一超级大国。^①因此,在美国依然占据权力优势的情况下,美国的案例还难以验证联盟战略在维护主导地位中的效用。不过,美国强化亚太地区的联盟网络,不仅增加了美国维系联盟的成本,而且刺激了

亚太盟友对于亚太地区现状的挑战,提高了美国卷入意外冲突的可能性。21世纪第一个十年后,围绕着亚太地区的南海、东海、钓鱼岛等,美国亚太盟友频频挑起争端,破坏了地区安全环境。这实质上既不利于亚太地区秩序的维持,从长远来看,也不利于美国维持主导地位。

编辑 李 亚

The Effectivity of Alliance Strategy:

Power Transition, Alliance Strategy and Dominance

YUAN Weihua¹

(1. *Tianji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 China*)

Abstract: Alliance was the enduring phenomenon under anarchy and also one of the key issues of studies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dominant state in the process of power transition invariably tries to adopt the alliance strategy for maintaining its dominance. In the transition of power, however, the dominant state is faced with stronger structural pressure, and demonstrates greater strategic dependence on allies. Therefore, it becomes much more difficult for the dominant state to manage and control its allies. At the same time, the alliance strategy of dominant state promotes existing alliance network to be more complex which increases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dominant state would be drawn into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The declining dominant state would progressively lose dominance once a great war breaks out, whether ends with a victory or defeat. The United Kingdom abandoned the policy of Splendid Isolation and turned to the alliance strategy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he July Crisis in 1914 was a regional conflict between Austria-Hungary and Serbia. Nevertheless, the allianc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Kingdom neither restricts allies, nor deters rivals. In the context that Russia, France and Germany were gradually involved in crisis, the United Kingdom, which didn't pay much attention to the crisis, could not refrain from being drawn into the conflict, and the World War I seriously weakened the United Kingdom. In the post-war reconstruction, the United Kingdom had no choice but to share dominance with the Fr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It turns out that the alliance strategy didn't act effectively in maintaining the dominance of the United Kingdom.

Key words: alliance strategy; power transition; dominance; the July Crisis in 1914

^① Stephen G. Brooks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The Once and Future Superpower: Why China Won't Overtake the United States", *Foreign Affairs*, May./Jun., 2016, pp.91-104; Stephen G. Brooks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America Abroad: The United States' Global Role in the 21st Centu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14-63.